

编者按 本期的三篇文章,以文学社会学视角,从不同侧面讨论“中国传统礼制的生成、定型、流变与诗礼文化的当代传承”这一重大问题。徐正英的“风”与“礼”,以“风”诗为例,以“嘉礼”为个案,探究周代《诗经》与礼仪制度规范层面的礼制——“五礼”之间的共生互动现象;马银琴的《礼乐互动中的〈诗〉》,从周代《诗》与礼关联互动关系入手,探讨了“诗礼文化”生成、定型、流变的基本路径;杨秀礼的《诗礼相成》,以用《诗》为个案,梳理春秋时期“诗礼相成”的演化历程,进而说明对西周传统“诗礼文化”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本途径。

“风”与“礼”

□ 徐正英

学界大多认为“二雅”“三颂”与礼制具有共生互渗关系,而往往忽略了“国风”与礼制所具有的这种关系。但笔者以为恰恰是这部分作品更具代表性,因为它们不仅是构成《诗经》的主体,其作者群体与诗歌内容也都更具有广泛性。本文仅就“风”诗与“嘉礼”的共生互渗关系举例略述,以管窥见豹。

“嘉礼”的具体功能是“亲万民”,主要包括饮食礼(宴饮)、昏冠礼(含笄礼)、宾射礼、飨燕(享宴)礼、赗膳礼、贺庆礼、乡饮酒礼、养老礼、优老礼、尊亲礼、巡狩礼等十一种类型,其核心为致亲(万民)。据初步统计,在“风”诗中,涉饮食礼者19首,涉昏冠礼者21首,涉其他婚礼者56首,涉宾射礼者5首,涉飨燕礼者8首,涉乡饮酒礼者7首,涉侍亲养老礼者3首,去其重复当有95首,占《诗经》中全部“嘉礼”类诗歌总数172篇的55%。

就其创作内容而言,像《周南·关雎》描写了“庙见成妇礼”仪式,且为依礼求偶的范本;《周南·葛覃》蕴含了“归宁父母礼”信息;《周南·汉广》为“亲迎御轮礼”与“留车反马礼”的形象描绘;《召南·鹊巢》描写了迎亲婚仪;《邶风·凯风》自责不能行“侍亲养老礼”;《齐风·猗嗟》再现了“宾射礼”场景;《邶风·东山》描写了“亲迎受女结缡”仪式;《邶风·七月》则蕴含了饮食礼、昏冠礼等诸多信息,描写了“飨燕祝寿礼”场景,等等。这都彰显出“风”诗与礼制之间的共生互渗关系。

就其运用形式而言,《周南·关雎》《周南·葛覃》《周南·卷耳》《召南·鹊巢》《召南·采芣》《召南·采芣》等六诗,都被用在行乡饮酒礼、乡射礼、飨燕礼、敬宾礼时定期演奏,且用于王后与国君夫人的房中之乐;在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中,对《召南·驹虞》用作宾射礼演奏的记载殊多。其用意是通过在礼仪场合演奏“风”诗,教化民人,协调关系。尤其

礼乐互动中的《诗》

□ 马银琴

近一百年前,胡适、闻一多等前辈学人为“恢复”《诗经》的文学面目而奔走呼号:“明明一部歌谣集,为什么没人认真地把它当文艺看呢?”(闻一多《匡斋尺牘》)。经过近百年的宣传与引导,《诗经》是中国“最早的文学总集”的观念深入人心。然而无论从作品创作、结集的目的,还是传承、使用的方式而言,《诗经》都与后世的文人诗歌有着本质的差异:它不仅仅是作为诗歌而存在,更是诗(歌咏)、乐、舞与礼结合的产物,其中承载着整个周代的礼乐文明。作为周代礼制之产物与组成部分的《诗经》,它的创作、结集以及传承的整个历史,始终与周代礼乐制度的发展演变息息相关。

商朝末年,居住于邠地的周族,因受戎狄部落的挤压,在古公亶父率领下举族迁徙。他们沿渭水西行至周原岐山一带,在漆水、沮水旁觅得可居之地,于是平整田地、筑室造屋,设“五官有司”而开启了走向文明的新生活。周民族最早的史诗《大雅·绵》,详细记录了古公亶父、建都的完整过程,具有典型的史官叙事的特点。武王克殷,举行祭祀文王的典礼之后,立政并追王烈祖,形成了体系完备、职责分野相对明晰的职官体系。武王克商后使用于仪式的《大雅·大明》,同样被视为周民族的史诗性作品,却表现出了与《绵》专注于记事相区别的、专注于颂赞的“商之稍后出现的《大雅·文王》,以“商之稍后,其丽不亿。上帝既命,侯服于周”“无念尔祖,聿修厥

是春秋前中期开始,各种重要场合兴起“赋《诗》言志”之风的同时,引《诗》以说礼之风也悄然兴起,使《诗经》与礼制得以并行传播,互渗得以深化,仅《左传》记载引“风”诗证礼就达30条,其中5条涉及“嘉礼”。比如,襄王二十八年(前625),鲁君子引《邶风·泉水》次章“问我诸姑,遂及诸姊”诗句,以待亲礼“姊亲而先姑”之道,讥讽宗伯夏父弗忌长幼颠倒的“逆祀”行为(《左传·文公二年》)。再如,简王七年(前579),晋大夫郤至(昭子·温季子)聘问楚国,共王用两君相见燕飨礼招待他,郤至便引《周南·兔置》首章“赳赳武夫,公侯干城”诗句,言以燕飨礼结好邻国而慈惠其民,便“政以礼成”;又引卒章“赳赳武夫,公侯心腹”诗句,言以超标燕飨礼收买人心,则适得其反(《左传·成公十二年》)。

就其理论阐释而言,孔子在继承前贤赋《诗》言志、引《诗》说礼阐释方式的基础上,进一步将《诗》、礼、乐的关系提升到理论高度予以确认,提出了“兴于诗,立于礼,成于乐”(《论语·泰伯》)的三种境界;借学习《诗》之文本以体悟其所蕴含的礼制精神,由涵养礼制精神而起身,最终达到能逐一演奏“诗三百”的高度,才算真正完成了《诗经》的学习。这无疑对诗礼互渗关系的深化起到了强有力的助推作用。具体到“风”诗与“嘉礼”的互渗,孔子与端木赐(子贡)借《卫风·淇奥》讨论人格修养精益求精,早已广为人知;其解《关雎》的精髓乃“反纳于礼”(《孔子诗论》,下同),亦为智慧之见,这个反纳的“礼”就是依“昏冠礼”求偶之礼;其解《周南·螽斯》为“君子”,即庆祝君子依礼修身而多福,亦颇得诗心;其首肯《郑风·将仲子》女主人公“《将》中言礼不可不畏也”,是因为发现了“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”礼制的敬畏;其喜欢《齐风·猗嗟》“四矢反兮,以御乱兮”诗句,也是因为诗句展示了宾射礼。

可见,无论“风”诗的创作内容,还是运用方式与理论阐释,都体现出其与“嘉礼”的共生互渗关系。从道理上讲,所谓“礼者,因人之情,缘义之理”(《管子·心术》),则描述日常生活风貌、抒发日常生活感情的诗歌,承载的社会生活习俗信息会更为全面而丰富,自然是最能反映社会生活习俗的诗作。我们知道,生活习俗是礼俗产生的社会基础,而礼俗则又是官方制定礼制的重要依据之一。故孔子认为“礼者,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,以为民坊者也”(《礼记·坊记》)。因此,只要“国风”产生的过程与礼制产生的过程具有共时性,其也应该和“雅”“颂”一样与礼制有着密切关系。

就现存160首“国风”作品而言,学界认为多数诗篇创作于春秋时期,但其中有些溯源于远古歌谣而其主体篇章产生于商代晚期,应当是没有问题的;有些则是在西周初年周公旦“制礼作乐”时将采集自民间的歌谣,改造配乐编纂到国家礼乐典章之中,之后又重新回归于社会而在不同礼仪场合演唱教化民众,也是没有问题的;即就是那些创作于春秋时期的讽刺“非礼”的所谓“变风”诗篇,其比照

的对象正是“有礼”——周公旦“制礼作乐”时所创立的礼仪制度规范。吴公子礼(季礼)聘鲁观乐时,赞美“二南”为“始基之矣”,称赞《邶风》为“周公之东乎”(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),即为明证;后来孔子嘱其儿子孔鲤(伯鱼)“不为《周南》《召南》,其犹正墙面面而立也与”(《论语·阳货》),也大有深意。

就西周礼制形成历程而论,同样发端于远古——殷因于夏礼,所损益,可知也;周因于殷礼,所损益,可知也”(《论语·为政》)。就其层次来看,由风俗而礼俗,由礼俗而礼制,而风俗恰恰是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的;就其范围来看,由民间而官方,从宗教到政治。当然,由上古礼制形成过程来看,是经夏商积淀而至西周礼制才得以完备的。故孔子说:“周监于二代,郁郁乎文哉!吾从周。”(《论语·八佾》)这表明西周时期才真正进入了礼制时代。即便到了东周中期开始出现了“周室陵迟,礼崩乐坏”(《礼记·礼运》)的局面,但仍有大批虔诚如周史叔过、卫执政卿甯速(庄子)、秦大夫百里视(子明)、曹大夫僖负羁、宋司

马公孙固、晋大夫羊舌肸(叔向)、吴大夫公子札、齐卿士晏婴(平仲)、楚行人观射父、郑执政卿游吉(于大夫)、“鲁司寇孔丘、陈芋尹盖者,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维护并修复着它。

由此可见,“国风”的创作、结集、传播与先秦“俗”→“礼”→“礼制”的积淀、完备、推行,是大体同步的。这就为两者共生互渗关系的可信性提供了历史背景依据。西周社会的礼乐文明是《诗经》产生的历史土壤,而《诗经》又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,扩而大之,从宗教到政治。当然,由上古礼制形成过程来看,是经夏商积淀而至西周礼制才得以完备的。故孔子说:“周监于二代,郁郁乎文哉!吾从周。”(《论语·八佾》)这表明西周时期才真正进入了礼制时代。即便到了东周中期开始出现了“周室陵迟,礼崩乐坏”(《礼记·礼运》)的局面,但仍有大批虔诚如周史叔过、卫执政卿甯速(庄子)、秦大夫百里视(子明)、曹大夫僖负羁、宋司

马公孙固、晋大夫羊舌肸(叔向)、吴大夫公子札、齐卿士晏婴(平仲)、楚行人观射父、郑执政卿游吉(于大夫)、“鲁司寇孔丘、陈芋尹盖者,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维护并修复着它。

由此可见,“国风”的创作、结集、传播与先秦“俗”→“礼”→“礼制”的积淀、完备、推行,是大体同步的。这就为两者共生互渗关系的可信性提供了历史背景依据。西周社会的礼乐文明是《诗经》产生的历史土壤,而《诗经》又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,扩而大之,从宗教到政治。当然,由上古礼制形成过程来看,是经夏商积淀而至西周礼制才得以完备的。故孔子说:“周监于二代,郁郁乎文哉!吾从周。”(《论语·八佾》)这表明西周时期才真正进入了礼制时代。即便到了东周中期开始出现了“周室陵迟,礼崩乐坏”(《礼记·礼运》)的局面,但仍有大批虔诚如周史叔过、卫执政卿甯速(庄子)、秦大夫百里视(子明)、曹大夫僖负羁、宋司

马公孙固、晋大夫羊舌肸(叔向)、吴大夫公子札、齐卿士晏婴(平仲)、楚行人观射父、郑执政卿游吉(于大夫)、“鲁司寇孔丘、陈芋尹盖者,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维护并修复着它。

由此可见,“国风”的创作、结集、传播与先秦“俗”→“礼”→“礼制”的积淀、完备、推行,是大体同步的。这就为两者共生互渗关系的可信性提供了历史背景依据。西周社会的礼乐文明是《诗经》产生的历史土壤,而《诗经》又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,扩而大之,从宗教到政治。当然,由上古礼制形成过程来看,是经夏商积淀而至西周礼制才得以完备的。故孔子说:“周监于二代,郁郁乎文哉!吾从周。”(《论语·八佾》)这表明西周时期才真正进入了礼制时代。即便到了东周中期开始出现了“周室陵迟,礼崩乐坏”(《礼记·礼运》)的局面,但仍有大批虔诚如周史叔过、卫执政卿甯速(庄子)、秦大夫百里视(子明)、曹大夫僖负羁、宋司

马公孙固、晋大夫羊舌肸(叔向)、吴大夫公子札、齐卿士晏婴(平仲)、楚行人观射父、郑执政卿游吉(于大夫)、“鲁司寇孔丘、陈芋尹盖者,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维护并修复着它。

由此可见,“国风”的创作、结集、传播与先秦“俗”→“礼”→“礼制”的积淀、完备、推行,是大体同步的。这就为两者共生互渗关系的可信性提供了历史背景依据。西周社会的礼乐文明是《诗经》产生的历史土壤,而《诗经》又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,扩而大之,从宗教到政治。当然,由上古礼制形成过程来看,是经夏商积淀而至西周礼制才得以完备的。故孔子说:“周监于二代,郁郁乎文哉!吾从周。”(《论语·八佾》)这表明西周时期才真正进入了礼制时代。即便到了东周中期开始出现了“周室陵迟,礼崩乐坏”(《礼记·礼运》)的局面,但仍有大批虔诚如周史叔过、卫执政卿甯速(庄子)、秦大夫百里视(子明)、曹大夫僖负羁、宋司

马公孙固、晋大夫羊舌肸(叔向)、吴大夫公子札、齐卿士晏婴(平仲)、楚行人观射父、郑执政卿游吉(于大夫)、“鲁司寇孔丘、陈芋尹盖者,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维护并修复着它。

由此可见,“国风”的创作、结集、传播与先秦“俗”→“礼”→“礼制”的积淀、完备、推行,是大体同步的。这就为两者共生互渗关系的可信性提供了历史背景依据。西周社会的礼乐文明是《诗经》产生的历史土壤,而《诗经》又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,扩而大之,从宗教到政治。当然,由上古礼制形成过程来看,是经夏商积淀而至西周礼制才得以完备的。故孔子说:“周监于二代,郁郁乎文哉!吾从周。”(《论语·八佾》)这表明西周时期才真正进入了礼制时代。即便到了东周中期开始出现了“周室陵迟,礼崩乐坏”(《礼记·礼运》)的局面,但仍有大批虔诚如周史叔过、卫执政卿甯速(庄子)、秦大夫百里视(子明)、曹大夫僖负羁、宋司

马公孙固、晋大夫羊舌肸(叔向)、吴大夫公子札、齐卿士晏婴(平仲)、楚行人观射父、郑执政卿游吉(于大夫)、“鲁司寇孔丘、陈芋尹盖者,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维护并修复着它。



孔子圣迹图

俎豆礼容

资料图片

春秋时期(前770—前453)《诗》在由集“诗歌(歌咏)”“音乐”“舞蹈”三要素合一的艺术形式,向“音乐”“舞蹈”与“诗歌”相互分离过程中,发生了“诗礼相成,哀乐相生”(《孔子家语·论礼篇》)的演化。对此,可以从《左传》引《诗》意义建构方法视角观之。

《左传》引《诗》用义方式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主要类型:

一是以辞相类,即借助词语的语义关联性特征,将《诗》中词语的本义转化为语义相关联的引申义。比如,惠王十六年(前661),北狄伐邢,齐大夫管夷吾(管仲)认为:“戎狄豺狼,不可厌也;诸夏亲暱,不可弃也;宴安酖毒,不可怀也。”(《左传·闵公元年》)其下遂引《小雅·出车》四章“岂不怀归?畏此简书”两句。此所谓“简书”者,本指诫命之书,即用于国家危难时刻相告求救之国书;而管仲则解释为“同恶相恤”,借此以劝说桓公“请救邢以从简书”。又如,灵王十四年(前558),楚康王熊昭即位次年,选择公族中一批贤能者担任重要官员以靖国人,鲁君子认为:“楚于是乎能官人。官人,国之急也。能官人,则民无贰心。”(《左传·襄公十五年》)其下遂引《周南·卷耳》首章“嗟我怀人,寔彼周行”两句。此所谓“周行”,即大道;而鲁君子则解释为“王及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、甸、采、卫、大夫、各居其列”,以美其使贤能者各就其位。

二是以喻相类,即借助词语的喻义关联性特征,将《诗》中词语的本义转化为语义相关联的比喻义。比如,襄王十三年(前640),随以汉东诸侯叛楚,楚令尹鬬穀於菟(子文)帅师伐随,取得成功;而鲁君子认为:“随之见伐,不量力也。量力而动,其过鲜矣。善败由己,而由人乎哉?”(《左传·僖公二十年》)其下遂引《召南·行露》首章“岂不夙夜,谓行多露”两句。此“谓行多露”,本为女子借仲春二月嫁娶成婚时节道路水多露水这一自然现象,表示自己有所忌畏而不行以婉拒骗婚者;鲁君子引之以隐喻违礼而行者必自取败亡,故必须要“量力而动”。又如,襄王二十五年(前628),晋司空胥臣(季子)举荐郤缺(成子)为下军大夫,文公以其“其父有罪”质疑之,胥臣曰:“舜之罪也殛殛,其举也兴禹。禹敬仲,桓之贼也,实相以济。”(《左传·僖公三十三年》)其下遂引《邶风·谷风》首章“采芣采菲,无以下体”两句。此本以采摘大头菜与萝卜

春秋时期一些贵族精英们采取上述多种类型的引《诗》用义方式——《诗》与礼新的纽结喻不以其恶而弃其善,以强调其君应取臣以善节之旨。

三是以人相类,即借助人物的行为关联性特征,以《诗》中词语本指之人转化为他指之人。比如,平王四十九年(前722),在郑大夫颖考叔成功劝说庄公寤生与其母武姜和好如初后,鲁君子指出:“颖考叔,纯孝也,爱其母,施及庄公。”(《左传·隐公元年》)其下遂引《大雅·既醉》五章“孝子不匮,永锡尔类”两句。此所谓“孝子”,本指主祭之周天子;而鲁君子则借指颖考叔。随着指称对象的转换,于是便将“吉礼”中的祭祖礼转化为“嘉礼”中的养老礼,将“人伦”关系拓展为“母子”“父子”关系。又如,襄王十七年(前636),郑文公世子华(子华)之弟公子臧(子臧)出奔宋国后,癖好戴鹖冠,文公便派人诱杀了他;鲁君子认为:“服之不衷,衣之灾也。”(《左传·僖公二十四年》)其下即引《曹风·候人》次章“彼其之子,不称其服”两句。此所谓“子”,本指“非礼”之曹共公;而鲁君

春秋时期一些贵族精英们采取上述多种类型的引《诗》用义方式——《诗》与礼新的纽结喻不以其恶而弃其善,以强调其君应取臣以善节之旨。

春秋时期一些贵族精英们采取上述多种类型的引《诗》用义方式——《诗》与礼新的纽结喻不以其恶而弃其善,以强调其君应取臣以善节之旨。

文学遗产

本报教育部 主办

北京语言大学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 协办

本期主编:邵炳军(上海大学教授)

2017年第36期 总第899期

(作者系上海大学诗礼文化研究中心讲师)

(作者系清华大学文学院教授)